

·石刻文献研究·

专栏导言

孟宪实

中国历史悠久,文献记载丰富。以汉字载体观察中国文化脉络,甲骨文、金文、简牍和纸张,各自堂而皇之地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书写。主力载体之外,帛练和石质材料是书写载体重要补充,石刻伴随着中国文献所有的历史时期。《墨子》多次使用这样的句式表达重要思想的传播:“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一个时代的书写载体,一一排列在此。石刻文献从未争得第一,但始终保持任何时代文献书写的替补地位。在书写的文化史上,石刻的资历最为悠久,独一无二。

中古时代,纸张是书写载体的核心,在特别追求传统的场合下,竹帛也会出席,但强调仪式或者纪念性的书写目标时,石刻是唯一的方式。遥远空间下的纪功碑,是将军的功绩,更是国家权力的体现。遍布州郡的功德碑、遗爱碑,表达的是民众对良吏的盼望。古刹寺观的修建、重修碑,代表社会信仰的承转起伏。每座石碑的树立,都是当时当地的盛事,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重要的人物去世了,但他的历史并没有被带走,读一遍墓前的石碑吧,他的丰功伟绩和人生赞美,都被恭敬地刻写在上面。这是比较常见的人生纪念碑,对于家族荣誉和社会影响,意义非凡。于是,追求碑体高大,记述详实,难免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方向。在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公布法令,墓碑尺寸要根据官品设计,不可任意施为。当然,更常见的石刻是墓志。即使做到五品大官,人生事迹也不能保证会进入国家的历史书写,虽然中国历代史馆工作都很繁忙。依靠自己才是正途,只要条件许可,所有家庭都愿意为去世的主人刻写一方墓志,表达人生的纪念。从请人书写到工匠刻石,凡此等等,是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条件不允许,哪怕仅仅写上死者的名字、去世的时间,哪怕是刻写在土坯上,追悼的情感表达是同样的。

所有的石刻,都重视当下的意义,同时也一定会着眼于将来。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古,这个经验很容易获得。墓志最能体现中国人一般社会意义的

历史观,即使很普通的人生历程,也希望后人有所了解。古人的这份苦心,今天终于获得回报。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石刻从来没有如今天这般受到学界重视。对于中国中古史的研究而言,敦煌吐鲁番文书之后,石刻文献成为最重要的新资料,而新史料从来都是历史学发展的动力。这里刊登的一组论文,以石刻史料为核心,或者介绍新出的石刻史料价值,或者利用石刻史料研究具体的历史课题,组稿有年,希望获得学界的重视与回响。

北魏宫廷有“子贵母死”的传统,这在当时就引起南朝的批评。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历程,伴随着皇帝制度的逐渐发展,“子贵母死”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存在。自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讨论这个问题之后,学界对该课题的重视进一步加强。蒲宣伊《子贵母死的谢幕——〈魏瑶光寺尼慈义墓志铭〉研究》一文,通过引入《高英墓志》探索北魏子贵母死现象的历史结局,作为新资料,这是其他研究者未曾措意的。此文的新贡献在于,除了提供新资料外,更重要的是学术新发现,即佛教在完成子贵母死历史终结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佛寺,特别是尼寺,政治斗争失败的女性如皇后,她们的去处只有死路一条。有了尼寺,她们的命运就有了不同安排,人性化之外,这为政治的文明发展也提供了新的可能。

新的石刻史料,通常会带来新信息,从而促进历史研究的进步。隋朝的历史并不长久,但因为地位重要,传世《隋书》常常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于是墓志成为隋朝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此前王其祎、周晓薇的工作最引人注意。党斌《新见隋代墓志铭三种考释》公布的三方隋代墓志,是陆融、陆贽父子墓志,另外一通为《乙弗明墓志》。陆氏是北朝大姓,作者考证传世文献对于他们的记载虽然不多,但可以联络起来的历史人物却不少,史学价值极高。乙弗明的名字虽然比较陌生,但若说这是赵贵之孙,则治北朝史者人人尽知。显然,这是北朝胡汉之间的重要史料,对于探讨这个时期的中国民族史,再添新证。

就民族史研究而言,传世文献的记载是相对缺乏的,因此新发现的石刻史料价值更加重大。葛逻禄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唐史上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受到史料的限制,许多研究课题无法进行。王庆昱、杨富学《洛阳新见唐葛逻禄炽俟思敬墓志研究》一文,又发现了葛逻禄的新墓志,因为熟悉研究史,于是研究获得新的推进。本文把已经发现的葛逻禄墓志,进行了综合考察。本文讨论的问题点,值得注意之处较多,比如葛逻禄的空间分布、内部关系、包括志主家族的历史,以及如何利用新出墓志资料与传世文献进行综合考察。一个葛逻禄家族的历史故事:曾经的部落领袖,多次前线战斗,最后几代人入居长安,逐渐汉化,就这样被勾画出来。可以说,没有新墓志的发现,所有这些新探讨都无从谈起。地不爱宝,中古民族历史的研究,看来仍然大有可为。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史,佛教道教的兴盛是一个重要特征,而唐代臻于巅峰。比较而言,佛教比道教更受欢迎,双方的竞争不仅表现在信众方面,也表现在政治资源方面。唐朝皇室对道教采取亲近支持政策,虽然从高祖时期已经开始,无疑在玄宗时期达到高潮,但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还是被时间淹没了。牛敬飞著《从近出高道田儋墓志看唐玄宗的崇道活动》,为唐玄宗道教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难得资料,对于理解唐玄宗的崇道行为增添了重要的新资料。志主虽然史书记载缺失,但从墓志的内容来看,竟然与玄宗皇帝互动如此频繁,受到皇帝如此信赖。玄宗时代的道教历史和研究,因为此墓志的出现,玄宗崇尚道教的图景变得更加丰富,相关研究再添动力。

盛会莲《唐刘如泉墓志研究——兼论建中年间中央与幽州政局》一文,利用《刘如泉墓志》资料,研究藩镇叛将的两面性问题,启发很多。刘如泉是朱滔的大将,为朱滔战死沙场。唐德宗建中三年,河北再陷于战乱,朱滔僭越,称大冀王。《刘如泉墓志》,在朱滔称王之后写成。这样的一篇地方文献,要怎样在唐朝的正统与朱滔的僭越之间找到平衡,确实值得研究。墓志没有标示作者,一个割据地区的文人,再没有了往日的忠君爱国,要不断地对朱滔歌功颂德,表达忠心。但另一面,他们也以获得朝廷的官职为荣,还一如既往地用唐朝官场的习惯表达荣誉,墓志的标题依然行礼如仪地写到《大唐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兼左金吾卫大将军上柱国刘公墓志铭并序》。在一个事实与价值观念都冲突的地方,这类文献极具历史性。

石刻史料为历史研究提供的新信息,存在着多方面的意义。新信息提供历史新证据,激活其他史料信息,推进历史的新认识。如果是伪造的新资料,则摧毁一切。事实上,随着石刻史料越来越受到重视,伪刻墓志以图牟利的行为也如影随至。本专栏首篇刘琴丽《三方北朝墓志辨伪——再论北朝墓志著录中的伪刻问题》一文恰好表明,石刻史料的使用,辨识真伪已经成为前提性的问题。作者考证《王颀墓志》为伪刻,来自对《王皓墓志》凿改;《东魏周利华墓志》是对《北齐王令媛墓志》的凿改;而《北齐口韶墓志》源自对《隋赵韶墓志》的凿改。伪刻都有出土信息不详的特征,文字部分错误如干支等,但如今这种墓志存在众多,可贵的是作者找到了伪刻的模仿来源,如此方有定案。这些伪刻,或者被人著录,或者被当做资料引用,证明伪刻已经造成不良后果。此文章的功德性还在于文后的《北朝伪刻(含疑伪)墓志》续补,列伪刻陷阱于此,警醒同行注意。

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新的研究,如今正在成为学界的新风尚,我们寄希望学者提供更多有价值的研究,这是对学术杂志的支持,也是学术贡献。